

回眸

种明钊文选

种明钊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回眸

种明钊文选

种明钊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眸:种明钊文选 / 种明钊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118 - 2140 - 9

I. ①回… II. ①种… III. ①法学—文集 IV.
①D9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0969 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责任编辑/陈 妮

装帧设计/李 瞻

出版/法律出版社

编辑统筹/财税出版分社

总发行/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固安华明印刷厂

责任印制/张宇东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293 千

版本/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网址/www.lawpress.com.cn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2140 - 9

定价:5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法学与经济学的穿织者

(代序)

对于近几十年来中国法学与经济学交叉和结合研究的水准与成效,方家各有所论,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研究在当代中国的起始,则源于种明钊老师的努力。几十年来,种老师不仅为在中国创立马克思主义法经济学不断鼓动与呼吁,而且身体力行,殚精竭虑,勤奋而执著地在两个学科交叉与结合研究中寻求创新与突破,形成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理论成果,由此也奠定了种老师在中国法学界的独特地位。与种老师一贯朴实、低调的行事风格相和应,我愿意把种老师在当代中国法学界的角色定位于“法学与经济学的穿织者”,并以此来表述和概括种老师的这种独特贡献。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伴随着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解放,社会科学中的新兴学科如雨后春笋。在新兴学科中,交叉学科尤显突出。作为置身于法律专业院校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种老师以他敏锐的理论思维,感知法学与经济学结合的必要与可能,进而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创立马克思主义法经济学的设想。尽管后来各种信息表明,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甚而更早期,法学与经济学结合而形成的法律经济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经济学已在西方世界风靡和盛行,但对于当时尚处启蒙阶段的中国法学界乃至经济学界来说,种老师的倡导仍然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

如果把种老师提出创立法经济学的设想仅仅归因于他对特定时期中知识潮流的顺应,势必不能真正把握种老师的学术品格和理论特质。我理解,种老师的这种创见主要还是得益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等经典原著中,包含着大量有关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法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架构,并且涵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范畴之中。正是因为种老师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深厚功底和素养,促成了他有关构建马克思主义法经济学的设想与倡导。无论是从种老师那篇《马克思主义法

学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的著名论文,还是从他主持编辑《〈资本论〉中的法律》都可以看出,种老师对法学与经济学交叉和结合的认知,实际上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长期研究和思考的延续与深化。

与前述因素相关,种老师视野中的法经济学,并不是一种由概念、逻辑、体系等要素系统地构成的一种知识学科;种老师也没有把精力用于向知识界推出一本教科书式的法经济学专著(在后来西方法经济学大量文献资料传入我国后,写出或主编一本教科式的专著,对种老师来说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我看来,种老师所倡导的法律经济学毋宁是一种理念:一种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基础把握法和经济关系的理念;一种方法:一种运用经济学原理与逻辑而阐释法律现象的方法;一种视角:一种从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及功利目标观察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效果的视角。正因为如此,种老师在提出建立法经济学后的数十年研究中,主要是把这样的理念、方法和视角带入到对具体问题或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以这种理念、方法和视角分析和评价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运行等当代中国经济生活与现象,并以这种理念、方法和视角解析和阐释法律制度(尤其是经济法律制度)的内在机理和应然状态。在此方面,种老师的研究主题十分宽泛,既有宏观方面对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律一般关系的理论解说,又有微观方面对农村土地制度、市场竞争规制、财政税收制度等具体问题的深度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无论对于引导我国法学理论界关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还是提升我国经济法学的理论素养,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近20多年来,偏处一隅的西南政法大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法学领域独领风骚,西南政法大学的经济法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重点学科,种老师的这些研究以及种老师在全国的学术影响无疑是关键性因素。

有关种老师在法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领域的理论贡献,不能不提及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培养。30年来,种老师除了承担了大量的本科教学任务以外,更亲自培养了数以百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即便在担任学校领导职务、主持学校全面工作那段时期,也从未中辍过研究生的教学,及至耄耋之年,仍有10多位博士生随他学习。由于种老师所指导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大多源出法律专业,因而,种老师总是把充填马克思主义经济

学理论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制度经济学)知识作为学生研习的必要过程,指导学生阅读相关原著,帮助学生打好经济学的功底。与此同时,种老师还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运行的现实,尽可能使学生的研究主题贴近中国社会的实践,回应中国法治建设和经济生活的实际需求。在受教于种老师的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都经历了法与经济理论的熏染,都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种老师培养的学生中,不少人今天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具有重要影响,种老师的学术思想也经此而薪火相传。

30多年前,我有幸成为种老师的学生。本科学习时,对于缺少基本理论思维能力的我来说,最难的学习科目便是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中最难理解的则是劳动的二重性和价值的二重性。但正是种老师清晰而生动的讲解,使我较好地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的这些原理,更有意义的是,我由此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研究生学习期间,在师从种老师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我对法律与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并且开始接触西方法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种老师的引导下,我还尝试撰写了有关法学与经济学结合方面的论文,并与种老师合作发表了一些共同研究的成果。不曾料及的是,在种老师引导和指导下所积累的这些经济学知识,为我后来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以及相关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依托于种老师帮我打下的这种基础,我在转入一个与法学几乎完全无关的领域和工作岗位后,很快适应了工作的要求。不仅如此,随着西方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理论在我国的进一步传播,我对法学与经济学的思考与研究又有了一定的深入,并形成了一些粗浅的研究成果,为我学术之路作了基本的铺垫。尽管近些年我的研究志趣更多偏向于中国法治现实尤其是司法制度,但马克思主义法律与经济观、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经济分析方法依然是我研究中的重要理论养分,这些知识及思维方式也使我的理论研究保有某些自己的特色。如果说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尚能取得些微成就的话,应当归功于种老师的启蒙和引导。

种老师于我,不仅具有学识上的师承关系,我个人的成长也受到种老师的很大影响。相识几十年来,种老师总是记挂和关切着我的成长和发展,无论是我患病住院还是工作上遭受挫折之时,种老师总是及时给我以

安慰和鼓励。1987 年调离学校后,我与种老师已疏于见面,这些年,甚至联系也很少,但我从多个渠道得知,种老师仍然对我付诸热切的关注。我始终认为,虽然种老师的弟子众多,桃李天下,但我是从种老师身上学到最多、受益最多的学生。时值种老师 80 华诞,作为学生,感念甚多,匆写数语,言不尽意,缀于种老师这本文集之前,聊充文集之序,更寄托我对种老师的崇敬之情和庆贺之意!

顾培东

二〇一一年春节写于三亚

目 录

第一篇 八十而忆

朝花夕拾:回忆我美好的童年和少年 / 3

一路风雨一路歌 / 7

如诗如画般的昆明七载 / 10

复回重庆,梦圆西政 / 13

竭忠尽智,服务西政 / 22

教书育人,在耕耘中收获快乐 / 32

第二篇 学术论文

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光辉典范

——学习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伟大精神 / 43

学习列宁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光辉思想 / 48

试论用法律办法管理经济 / 55

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经济立法 / 59

正确发挥国家在经济调整中的作用 / 64

试论用法律手段制裁浪费 / 69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基础与法经济学的建立 / 75

略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法律思想 / 80

西方法经济学评介 / 88

- 论我国立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 / 92
- 论超前型立法 / 100
- 《中国农村经济法制研究》前言 / 107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 110
- 繁荣法学要重视对经济学的研究 / 128
- 加强教学管理,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 / 129
-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政府高强度干预 / 133
- 论西部开发中的有效制度供给 / 142
- 加入 WTO 对我国经济法教学影响的几点思考 / 154
- 经济人与国家干预法 / 157
- 如何运用制度克服信息失灵
——《信息失灵的制度克服研究》评介 / 173
-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前言 / 187

第三篇 给博士生专著写的序

- 《行政垄断的法律控制研究》序 / 193
- 《证券公开规制研究》序 / 195
- 《经济法实质化研究》序 / 196
- 《外资银行风险控制法律问题研究》序 / 200
- 《搭售的经济效果与法律规制》序 / 203
- 《网络型公用企业竞争的法律规制》序 / 206
- 《信息、权利与交易安全:消费者保护研究》序 / 209
-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转型与转型期经济法研究:中国
经济法学理论的反思与追问》序 / 212
-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序 / 214

第四篇 会议讲话

- 回顾过去,激励将来
(在建校 40 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 219

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加快改革步伐,为把我院办
成全国一流政法大学而奋斗

(1992年10月28日在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 223

势在必争,志在必进

(在《司法部与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共建西南政法大
学的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 / 230

发挥普通高等学校优势,稳步发展成人高等教育

(1992年在西南政法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
的讲话) / 232

要重视对经济法学范畴的研究

(在广东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上的
发言) / 240

附录

种明钊 苍竹一竿风雨 长年直写青云 / 245

领导班子应吸纳法律人才

——人大代表种明钊一席谈 / 249

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校长种明钊教授呼吁

——扶贫工作要纳入法制化轨道 / 250

当代中国法学名家:种明钊 / 252

后记 / 272



第一篇

八十而忆

朝花夕拾：回忆我美好的童年和少年

(一)感恩母亲

我于1932年6月(农历五月二十日)出生在山东滕县(现山东省滕州市)后学村。这里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一方孕育了孔孟思想、礼乐文化的沃土。据我父亲说,我祖辈以务农为生,受传统思想影响,以乐善传家。所以我从小便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教化,切身感受儒家文化的深邃与广博,这为我后来的道德修身、治学处事以良好铺垫。

我六岁那年,即1938年,家乡因受日本侵略而沦陷,遂跟随母亲历尽千辛万苦赶赴重庆投奔父亲。记得那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那年妹妹四岁,弟弟两岁)三个孩子先是冲破日军封锁线来到徐州,又从炮声隆隆、兵临城下的徐州乘火车辗转抵达武汉,最后从成天被日军狂轰滥炸的武汉乘坐民生小轮船,历经20多天的水上颠簸终于到达重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母亲裹一双小脚,肩背行李,怀抱弟弟,一手牵着我,另一手领着妹妹,跋山涉水。一路上是何等危险、何等艰难!即使换做现在的交通条件,让一位妇女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从山东乘火车到重庆也是相当困难的。母亲不畏艰难险阻的勇气和毅力令人赞叹。

起初我们住在市中区观音岩附近的神仙洞。不久,因日军飞机轰炸,不得已由母亲带着我们兄妹疏散到歌乐山山洞四合岚垭(现为歌乐山镇山洞村草房湾)的一偏僻村庄。在这里住了大约3年,直至我读完小学三年级。农村条件虽然艰苦,但是乡村生活却充满了无穷乐趣。山间舞动乱飞的昆虫,树上跳跃鸣唱的鸟儿,小溪里自由自在的鱼蟹,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挥之不去。乡村父老为人淳朴厚道、勤于劳动、乐于助人的良好品德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我。更使我受益终生的是,幼时在农村经受的劳动磨炼。

到山洞村后,靠父亲每月那微薄的工资根本无法维持一家六七口人的生计。我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在妈妈的带领下,就在房前屋后开荒种地,开垦出的菜地大约相当于一个排球场一般大,种有白菜、莴笋、辣椒、豇豆、四季豆、茄子、红薯、土豆、包谷、向日葵等,足够我们全家人食用菜

蔬之需。总之,那时我确实像一个地道的农家子弟。由于劳动时间较多,加之农村条件差没有电灯,夜间使用菜油灯,所以学业成绩不是很理想。

在山洞村期间,父亲在城里上班,每周回来一次,对我少有教育。不过有一事却令我终生难忘。大约在我小学二三年级时,有一天我向同学借了一个水壶背在身上,回家后被父亲发现。他声色俱厉、大发雷霆问我水壶从何而来?我立即申明是向同学借的。不料却遭到一顿毒打。次日他对我晓之以理,大致的意思是借人东西容易发生纠葛,如果弄丢了、弄坏了就得赔偿;如果买不到就会引发麻烦,大家都不愉快。如果借公家的东西就更复杂了,如果不还或逾期不还,就算贪污。他对借东西尚且如此反对,对收受别人财物就更不用说了。在父亲的这种影响下,我自小就立志:一是要干干净净做人;二是远离经济工作。几十年来我一直奉行这两条,就是在当学校校长期间我也从不管钱。

到1942年,由于反法西斯力量的增强,日军对重庆的轰炸较以往减少了一些,我家迁到南岸文峰塔下的向家坡复兴村,我在这里读到小学六年级上学期。由于我的学习成绩始终不好,父亲担心我能否考上一所好中学,所以让我转学到广益中学附小读六年级下学期,以便能顺利地进入广益中学读初一。这年我12岁,初次离家住校,十分想家,终日盼望星期六尽快到来,早日回家。

在广益附小学习期间,有一事令我难忘。1945年夏的一天我正上体育课,突然发现母亲站在足球场远处的一角,并示意她在那里等我。下课后,我赶紧跑到母亲跟前,她将我带到操场旁边的树荫下,揭开手提的小竹篮上的白布,两只鸡腿和两个白白的馒头立刻闪现在我眼前,她十分高兴地对我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把它们吃了,我好回家做晚饭。”母亲是一位北方小脚女人,她从家到学校,要走好几里山间小路,对我的疼爱如此这般,不仅体现在语言中,更是真真切切地付诸行动上。母亲对我的期待和关怀,我幼小的心灵已开始有所领悟了。

(二) 印象中的“广益”与“五华”

1945年9月,我考入广益中学读初中一年级。当时,广益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名满重庆。校长杨芳龄是一位英国留学生,精通教育,善于管理。平素出现在学校总是前呼后拥着一群洋犬,好像还拿着一根文明棍,



颇有绅士风度。他的儿子叫杨伯庸,担任训育主任,20世纪90年代任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我还拜访过这位老师,不过他已不记得我了,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愉快地交谈。我对广益中学的老师至今有印象的有一位英籍教师霍尔德,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管理学生十分严格,甚至有时还动手打人,显得很不文明。还有一位赵老师任教务主任,成天拿着一根叶子烟的烟杆,他教地理,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使人见而生畏,但学生并不恨他。广益中学非常重视外语教育,它的足球队、垒球队在全市也是有名的强队。20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开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王家福教授在交谈中得知他也是广益的学生,不过比我高一个年级。总之,在当时它是重庆的一所名校,解放后改为第五中学,“文化大革命”之后,又恢复了原名“广益中学”。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我的父母、弟弟、妹妹迁往昆明。1946年7月,我读完初中一年级,也离开了广益中学到昆明,并考上了昆明私立五华中学。学校的董事长李根源是国民党元老和著名爱国人士,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的老师和领导。校长是西南联合大学毕业的李希泌,李根源的儿子,他奉行“教育救国”的理念,邀约了一批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生创建了五华中学。这所学校在昆明是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它的教师,除了美术、体育、音乐课的教师之外,其余几乎都是李希泌在西南联合大学时的同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的一些教授也在五华中学做兼职教师,如朱自清先生等。

(三) 杨老师和我

在去昆明前,我学习不太用功,成绩不甚理想。到昆明不久,因为父亲工作调动,父母托付一位杨老师关照和督促我的学习,所以我初二、初三都与杨老师生活在一起。可以说,无论做人还是治学,杨老师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杨老师长我10多岁,高中毕业后被录用为一名小职员,学习勤奋刻苦,写作能力强。他每天下班饭后回到宿舍就开始读书学习或写作,直至深夜十一二点,甚至更晚,次日清晨五六点钟起床,至少学习1个小时,然后去上班。他常对我说:“一个人若无‘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是做不出学问的。”受其影响,我养成了晚睡早起的学习习惯,熬夜的本领特强,记得初中毕业考试期间我三天三夜没合眼,致使我终身患有失眠

症,始终不愈。

杨老师酷爱古典文学,擅长写作,对我的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的学习基本上从不过问,重点教我学习“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宋词。不管我是否读懂,首先是背诵,就这样反复地读了背,背了忘,忘了又背。由于他向我全盘灌输儒家思想,久而久之,我的确把“孔孟之道”奉为经典,言必孔孟,身体力行。杨老师的教育方法是十分值得推崇的,即使对我做得不好的地方他往往也能“视而不见”、极少批评;相反,当我有一点微小的进步和成绩,譬如,我功课考试成绩提高,一篇古文背诵无误,他总是赞不绝口,褒奖有加。使我从内心感到受之有愧,必须持之以恒,不然有违他的夸奖而内疚难安,无面见他。

杨老师既酷爱读书,还喜爱写作,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其内容多为揭露社会的黑暗、抒发对旧社会的不满。起初我是羡慕他、佩服他,后来,也仿效他这么做。大约我读初三时写了一首小诗。他看后非常高兴,还提出修改意见,鼓励我投寄报社。他给我出主意:取个笔名,刻个图章,我都一一照做。稿件寄出后不久,果然报纸上发表了。

文章的发表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也给了我信心,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在我中学期间,发表各种小文章不少于20篇。我保存下来的不足10篇,曾到云南省图书馆查找,只找得几篇。遗憾的是,有的报纸残缺不全,有的似乎被人撕走。

总之,杨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首先,他使我从一名不怎么爱学习的少年,转变成了一位比较自觉用功学习的少年。在初中阶段,由于学习成绩进步,第一次获得了学校发给我的乙等品学优良奖状,以后又进一步提升不断获得了甲等奖状。由于五华中学是私立学校,学费很贵,受此奖励,也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其次,杨老师对我循循善诱,使我懂得了一些传统道德文明,比较自觉地去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他灌输给我的孔孟之道的许多修身道理,影响了我的一生。诸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等等。在这两方面,杨老师使我受益良多,我亦对他感激不已。后来听说,在20世纪60年代他已病逝。

一路风雨一路歌

(一) 启蒙与“新锋”

在初中二年级期间,我和与我非常要好的同学杨增录,一起跟着他姐姐参加新锋歌咏队的活动。后来得知,它是由多所学校的学生组成的歌咏团体,主要成员是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大学的学生,另外还有一些高中生;新锋歌咏队中有个别人是“民青”的成员(云南民主青年同盟)和共产党员。从那时候起我和杨增录每个星期日就到那里唱歌,不久也就成了新锋歌咏队的成员,是歌咏队里年龄最小的。我们初到新锋歌咏队,队长是陈之翰,是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不久他便离开了,听说参加游击队了,接替他的是徐仁信,也是昆明师范学院的学生。1949年徐仁信被特务逮捕入狱,昆明解放后出狱,担任第一任昆明市总工会主席,后任昆明市副市长、市人大副主任。1984年,我到昆明给函授81级的同学颁发毕业证书,在会上见到徐仁信,但未能详叙别情。

新锋歌咏队的活动主要是唱歌,也有诗歌朗诵、出壁报、公演节目、郊外旅行等。唱的歌主要是歌唱民主与自由,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有苏联歌曲,如《我们是红军战士》、《伏尔加船夫曲》、《再见吧!妈妈!》等;更多的当然是中国歌曲,如《黎明颂》,歌词是“喜讯,人类的喜讯,苦难的黑夜,已经过尽,黎明来临……我们万众一心,迎接新生”;还有《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民歌主要是云南民歌。

在新锋歌咏队的影响下,我相继在《正义日报》、《复兴晚报》等报纸上发表了一些带有政治倾向的文章,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道德沦丧以及人民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悲惨境况。我在《装模作样》一文第1段就写道:

黎明将临,国家也渐渐走上民主的道路,但有钱有势的达官显贵和豪门大贾们,反而内心惶惶转侧难安,大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他们知道纵有飞天的本领,又岂能逃出“清算”的手掌和惩罚的圈子呢!